

# 海南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过程

王 翔

(海南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明中期以降, 在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浪潮中, 海南岛占有重要地位, 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很不充分。把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置于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大背景中加以把握, 从中、英、日三种文字资料, 可以大致勾勒出海南人移民东南亚历史过程的基本脉络。

**关键词:** 海南人; 移民; 东南亚

**中图分类号:** K291.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53(2001)06-0090-12

历史上, 琼州是华人向海外移民的四大口岸之一。海南人移民海外的主要地点是东南亚。然而, 长期以来, 国际学界对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一向重视不够, 国内对这个领域的专门研究也非常之少。之所以如此,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 百多年来琼侨在南洋一带社会地位不高, 近十几年来虽然有所改善, 但与闽、粤等其他地区相比, 成功的工商界人士毕竟不是很多, 富甲一方的殷商巨贾更是凤毛麟角, 而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容易把视线集中在华侨中的富商巨贾、达官显贵身上, 生活在社会中下层, 以劳苦大众占多数的琼籍华侨, 自然容易被历史学家所忽略; 另一方面的原因, 则是海南的历史学者太少而研究海南的历史学者也不多, 还没有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 难以提出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 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尚处于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起步阶段。本文试图在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基础上, 初步勾勒出琼侨移民南洋的大致脉络, 探讨触及这一课题的若干问题。自知初涉此域, 疏误难免, 尚祈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研究海南人移民南洋这一课题, 必须将之置于中国人向海外移民这一大背景之下, 才有

可能说得比较清楚, 研究得比较深入。

“华侨”(Overseas Chinese)一词, 用作指称侨寓海外的中国人的专门词汇, 出现的时间并不十分久远。尽管历史上早有华人移居海外的事实, 但是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成立, 才正式将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称为华侨。那些海外中国人, 也称自己为华侨, 以表明与祖国的关系, 对祖国和家乡的建设提供种种力所能及的帮助。[1]从概念的定义上讲, 严格说起来, “华侨”指那些移居海外, 保有中国国籍的人们; 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 称作“华人”或“华族”; 而在海外出生的第三代, 则称为“华裔”。不过, 在习惯上一般仍是将这三类人统称为“华侨”或“海外华人”。本文正是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 使用“琼侨”这一概念的。

中国, 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与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往来, 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古代。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 中国民众前往海外, 不再回国而留居当地的情况早有发生, 其数量激增则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此时, 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可以大量造出用于外洋航行的船只, “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极多, 数达千余只。”(《清圣祖实录》卷二七〇) 这些海船包括船员和客商, 每船可载百余人上下, 少亦可载六、七十人, 此外还可搭载大

收稿日期: 2001-06-30

作者简介: 王翔(1956—), 男, 山东文登人,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日本国立名古屋大学博士。

量货物。(道光《厦门志》卷五《洋船》)日本学者指出:“使大量民众移居海外成为可能的最大因素,不可不注意到中国帆船的存在。……一船可载百余人渡海,这是在西欧大型帆船进入中国海域之前,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所未见的情形。”[2](P78)

这种大型海洋帆船的出现,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后期的百余年间,搭载大量物资和人员横渡大洋,不仅往来于中国大陆沿海各岛屿,还进出于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群岛、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的各港口。“往海外贸易之所,东为琉球、日本、朝鲜,西南为安南、吕宋、噶喇吧、苏禄、暹罗、马辰、六坤、宋居 等国。”[3](P707)在这样的海外贸易中,南洋一带占有更大的比重。乾隆后期,广东官员在奏报中说:“商人中去东洋者十分之一,去南洋者十分之九,江、浙、闽、广之税银多出于此。如一旦禁遏,则四省海关税额必然欠缺,每年统计不下数十万,于国家财政有损。”(乾隆《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七,《广东 监察御史李清芳奏文》)18世纪中叶的乾隆十六年到二十一年(1751—1756年)的六年间,从福建出海的 中国商船每年达 60—70艘;乾隆十七年(1752年),由广东出海的 中国商船为 20—30艘。由此可知,仅闽、粤两省,每年出海的商船就在百余艘上下。[2](P75)这些船只乘阴历 10月到 2月左右的季风出海,于 6月到 8月左右归航,几乎是定期地航行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一带,不仅使各国、各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成为可能,给国家财政带来大量收入,同时也提供了使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过剩人口向海外移民的机会。

大约从明代中后期开始,中国东南沿海的劳动人民就已经成群结伙,随贸易商船到南洋 佣工或移民。明万历二十年(1592—1594年)的福建巡抚许孚远在《通海禁疏》中说:“东西二洋商人,因风涛险恶,有经冬不归国者,吕宋尤多。漳(州)人于该地交易,父兄长期居住,子弟时常往来。如今留居吕宋者不下数千。”(《敬和堂集·疏》页六)入清以后,“华工仍多私自出洋者”。[4](P27)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上谕中说:“海外吕宋、噶喇吧(即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笔者)等处,常有汉人留居。”(《清圣祖实录》卷二七〇)雍正五年(1727年),广东、福建的地方官员曾经受命调查前往噶喇吧、菲律宾等地船只的情况,闽浙总督高其

俾奏报商船夹带华工出洋情形说:“每船实皆秘密搭载二、三百人,到达彼地后,乘船名簿上未载姓名者皆留居于此,不再归国。遂使嗜利船户只装些须货物,竟将游手好闲之人,偷运四、五百人之多,每人收银八两或十余两,即将彼等载往彼地”,而且“到彼即行留住”。(《雍正《东华录》卷十二,页三)据说当时的噶喇吧已“有万余人,或称有数万人者”。[5](P26—27)雍正九年(1731年)“有石祥瑞一船,雍正九年二月内为吕宋贸易密载铁器,又查有偷出国境者百余名乘船。”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福建南部的官员发现:“商船户姚锦春一船前往吕宋贸易,有船员二十四名,商人二十名,此外还有未经许可之偷出国境者一百五十七人。”[6](P353)

除中国方面的史料外,由日本方面留存的历史记载中,亦可察知当时中国海外移民的一些情况。江户时代(1603—1867年)长崎贸易的商人报告中,透露出了海外中国移民的一鳞半爪。在马六甲,日本贞享四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厦门商船报告:“马六甲的住宅唐人为数甚多。”[7](P721)这里所说的“住宅唐人”,为江户时代日本人对留居海外的华侨的称呼。同年,马六甲的商船报告:“马六甲有荷兰人二百余名”,“有住宅唐人七、八十人”。[7](P778)

在马来半岛东岸中部的港口大泥,贞享四年的大泥商船报告:“大泥为四季温暖的热带国家……住宅唐人有四十余名”。[7](P798)元禄三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大泥商船再次报告说:“居住于大泥的住宅唐人有数百名之多。”[8](P1270)短短三年之间,居留的华侨人数由四十余人增至数百人,增加了 10 倍以上。

在泰国,据延宝八年(康熙十九年,1680年)来自暹罗的商船报告,也有“住宅唐人”在此居留。[7](P309)

在柬埔寨,元禄四年(康熙三十年,1691年)柬埔寨商船报告:“当地住宅唐人共有千余人”,连该国行政官员中也有“唐人共勤役”。[8](P1373—1374)

在雅加达,元禄三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喇吧商船报告,当地有“大小二十余艘中国商船不绝往来,住宅唐人有数万名。”[8](P1268)享保三年(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由噶喇吧前往长崎贸易的船主名叫郑孔典,自称“本为福建漳州人士,已在噶喇吧居住二十余年”。[9](P2833)19世纪前期涉足印度支那的英国人约翰·库劳福特(John Crawford)在英国议会听

证会上的报告说：在菲律宾、布里南、爪哇、新加坡、马六甲、马来半岛、暹罗、交趾支那等地居住的中国移民，总数约为 73 万 4000 余人。[10] (P297)

在早期的海外移民中，以福建、广东两省的人士为多。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九日，闽、粤地方官员在奏折中称：“前往噶喇吧、吕宋等处贸易居住者，福建省为十之六、七，广东与江苏、浙江等省为十之三、四。”[11] (P836-837) 可知海外移民者多为中国大陆东南部沿海各省民众，其中尤以福建为多。而移民的福建出身者中，又以“漳(州)、泉(州)等地民众留居噶喇吧、吕宋者为尤多”。[12] (P473) 海南当时隶属广东，在广东省的对外移民人数中，当也包含一些从海南岛前去的人士。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清朝统治者对于东南沿海地区民众移民海外的政策变化，及其对于移民活动的影响。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国内出海从事南洋贸易者在吕宋、爪哇等地居留的人数不断增加，为了防止国内米粮流出、船舶私贩、连接海盗或外人以危及国内秩序等情况发生，清政府发布命令，除了国内沿海贸易和日本贸易外，与南洋的贸易一概禁止；来航的外国商船，允许其贸易，但是要置于严格的监视之下。(《清圣祖实录》卷二七〇、二七一) 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南洋海禁”时期。这一南洋海禁延续了十年之久，一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才由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奏请而解除，因为高其倬在奏折中强调了实行海禁严重威胁到了沿海地区的居民生活、社会经济和统治秩序。(《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四) 但是，康熙时代所采取的禁止海外居留民众归国的政策，仍然为清朝政府所继承，原因在于统治者担心这些海外侨民归国后会与内地民众相互串连，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11] (P837)

这一严格禁止海外侨民归国的政策，到乾隆元年(1736年)开始放松。清政府表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前出国未归者，只要得到船户的担保就可以回国。(《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五) 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同意将商船出洋的期限延长到三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又进一步规定，无论何时出国，在海外居留的中国人全部允许归国。(《光绪大清会典事

例》卷六三〇) 当然，以上法令都是针对那些正式得到出国许可者而言，而对于那些非法出国者，则依然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乾隆五年(1740年)，在南洋爪哇，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屠杀当地居住的一万多名华侨的严重事件。[13] 这一事件，于乾隆七年经闽浙总督策楞的上奏而传到京城。就如何处置这一事件，朝廷内部议论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有人主张全面禁止南洋贸易，有人主张单独禁止爪哇贸易，也有人主张照常维持南洋贸易，不作任何反应。尽管主张各有不同，但都是只从政治影响、经济利益方面来考虑问题，在朝廷官员的心目中，都是将海外华侨视为“天朝之弃民”，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不同。最终，朝廷讨论的结果是决定不对荷兰人采取任何制裁措施，南洋贸易仍像往常一样进行。(《清高宗实录》卷一六七)

18世纪的清朝，可以说是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由朝廷对荷兰殖民者屠杀印尼华侨事件的处理，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政府对于“华侨”的一贯态度，即将那些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视为“天朝弃民”，认为他们在海外受到迫害是自作自受，不值得为此采取行动。[14] (P1156) 可以说，清政府对于海外华侨，一贯是持怀疑、恐惧和戒备态度的，对于海外华侨的利益，也是漠不关心的。同时，那些由海外归国的华侨也往往受到各级地方官吏的敲诈和迫害，因而海外华侨对清朝政府也很不信任，尽管清政府一再作出允准华侨归国的姿态，广大华侨却并不很领这个情。[15] (P87-125)

## 二

海南岛与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例如1688年，驶入日本港口进行贸易的中国船只共有193艘，其中来自海南岛的有3艘，占总数的1.6%。在日文的历史资料中，还记有从海南岛到达日本长崎商港的航海所需时间为15-18天<sup>①</sup>。[16] (P38-39)

海南岛与东南亚地区的商业联系，历史上就更为密切了。英国人库劳福特曾于19世纪前期来东南亚一带游历考察，在游记中写下了中国各地与印度支那保持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其中有关于海南对外贸易的重要资料。库

① 当然，对于海船航行来说，有顺风 and 逆风的不同情况，航海所需的确切日期难以确定，这里只是大致上所需的航海日数。

劳福特记述说：“(中国)与印度支那保持交通的港口,有广东省的5处,即广州、潮州、南澳、惠州、徐闻,还有属于海南岛的各个港口,以及福建省的厦门、浙江省的宁波和江苏省的苏州。西贡港的对中国贸易每年总计通例如下:即海南帆船15—25艘,每艘载货2000—2500担;广东帆船2艘,每艘载货8000担;厦门帆船1

艘,载货7000担;苏州商船6艘,每艘载货6000—7000担。总计帆船约30余艘,合计载重量约6500余吨。价格最高的货物由厦门输入,主要是刺绣的丝织物和茶叶;价格最低廉的货物来自海南岛。”[17](P511—512)根据该书记载,19世纪前期,每年海南和中国其他地区商船与越南各港口贸易的情况,如下表17(P78)所示:

越南地名	西贡	会安	顺化	东京	其他
海南船只数	15—25	3		18	
每艘载货量	2000—2500担	2500担		2000担	
广东船只数	2	6		6	
每艘载货量	8000担	3000担		2000—2500担	
厦门船只数	1	4		7	
每艘载货量	7000担	3000担		2000—2500担	
苏州船只数	6	3		7	
每艘载货量	6000—7000担	2500担		2500担	
合计船只数	30	16	12	38	20
贸易总吨数	6500	3000	2500	5000	2300

1824年,到达新加坡的中国帆船载货量为825吨,货物价值135000元。1825年,到达新加坡的广东商船载货375吨,价值20000元;厦门商船载货476吨,价值100000元。同船到达的还有1295名乘客。[18](P154)这样,推测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海南人,为了经商需要及其他需要,就此留居东南亚各处,恐怕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在下面将要讲到。在进行海外贸易的过程中,不仅是商人和商品的往来,还有搭乘商船每年大量前往东南亚的移民,生活物资的输送,各种信息的交换,向本国亲属寄送金钱等等,也一直在持续着。“于是,东南亚与华南沿海地区就结成了人员与物资交流的不解之缘”。[19](P87)

福建、广东两省到南洋佣工和向南洋移民人数较多,除了地理位置便利、前往经商贸易等原因之外,也是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耕地严重不足。1661—1812年的150年间,福建的人口增加了9倍,耕地仅增加32%,每人平均占有耕地数从7.11亩降到0.9亩;同一时期内,广东的人口增加了20倍,耕地仅增加27%,每人平均耕地从25亩降到1.67亩。<sup>①</sup>因此,尽管“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滩、江中洲均已开垦无余”,仍然“竭一人终岁勤劳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蓄”,甚而“力难自贖”,以致“流为游手、为佣丐、为会匪者,所在多有”。(《薛福成日记》卷

六,页十二至十四)海南的人口压力情况虽然不及广东、福建两省严重,但岛上内地为黎族、苗族民众所集聚,遍地榛莽,民族关系恶劣,汉族人民不能深入垦荒,土地资源迄未开发;沿海地区则地瘠民贫,灾害频仍,耕作方法陈旧,农业生产不足以自给。而“噶喇吧米粮价廉,工技之人易于得利,遂蓄发留居于彼,结婚育子,不思故乡。”[20](P5)海南的居民,多系福建、广东等华南沿海地区前来的移民,与那里声气相连,信息相通,这也成为促进海南人民向海外移民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可以想见当会有人前往南洋投亲靠友,移居谋生。“海南共分16县,但移居南洋的海南人乃以文昌、琼山、乐会、琼东四县为多”,[21](P265—270)正是由于这些缘故。

### 三

19世纪中期以后,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相继被纳入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欧美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电信技术革命的推广,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大米、砂糖、橡胶、锡、石油、油料作物等所谓初级产品向欧美国家的输出成为可能,而支撑着这种输出的港口、城市建设及其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的配套,也在列强的支配下不断取得进展。

<sup>①</sup> 这是据1661、1812两年人口和耕地数计算的,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第6—9页。

这样一来,东南亚也就与非洲、拉丁美洲和大部分亚洲其他地区一起,变成为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初级产品的重要供应地。

东南亚地区的陆续开发,锡矿业和橡胶业急剧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也就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非洲奴隶贸易停止,世界范围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十分尖锐。于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便把注视的目光投向紧邻东南亚的中国华南沿海,力图在这里找到新的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这时,正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欧美列强的压力下逐步对外开放,传统的海禁政策日渐松弛。内外因素的相互凑合,使得华南沿海地区民众更大规模地向

东南亚移民成为可能,同时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移民东南亚华侨的基本性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指出:“在中国移民人数最多的东南亚地区,因十九世纪中叶非洲奴隶贸易停止,劳动力不足而导致的苦力移民占压倒多数。这是由于刚刚开发的东南亚地区,殖民地农业和矿业生产中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的缘故。”[22]

欧美殖民者通过代理人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招募劳工,甚至采取诱骗拐卖的手段,把华人劳工当作“猪仔”贩运到南洋去。当时南洋各地以及广州、香港、澳门等处,把华工称为“猪仔”<sup>①</sup>,或称“苦力”。严格说起来,“苦力”贸易与“猪仔”贩运还是有区别的,据以往的研究,主要区别包括下列诸项:[23](P62)

	苦力贸易	猪仔贩运
性质	契约工(Contract labor)	债奴(Indentured labor)
契约	出国前强迫签约	到达目的地出售时同雇主签约
契约期限	5—8年	1/2—3年
去向	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大洋洲各岛	东南亚各地
掠贩者	西方人口贩子,投机商及代理人	华人猪仔头、“客贩”
成本	100—150元	20—40元
售价	400—500元	100元
工资	每月4元	每月5元
扣还欠债	不扣款	分期扣还身价

尽管具有以上几个方面的差别,但无论哪一种称呼,都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华工形同奴隶的身份和苦难辛酸的经历。当时,海峡殖民地(包括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的猪仔贩运十分盛行,新加坡成为吸引和转贩华工的最大中心,在这里开设有收容华工的客馆(客栈),名为“猪仔馆”,实际类似牢房。1906年时,新加坡有猪仔馆“二十余家”。<sup>②</sup>这些猪仔馆与香港、澳门、汕头、海口等地的猪仔馆声气相通,同恶相济,大肆进行诱拐华工的活动。1855年时,澳门有猪仔馆5所。而直到1906年,香港还有23家囚禁苦力的猪仔馆。汕头一地,“已有猪仔馆二、三十家”。[24](P187)<sup>③</sup>海口也是近代华工出洋的主要口岸之一,海口海关和新兴街等处也有外国投机商及招工贩子设立的收买华工、经办华工出国事务的机构和猪仔馆多处。每当船期一到,被掠之华工就被绑架上船,运往南洋或北美洲。[25]到达新加坡的猪仔(亦称“新客”)

即住在猪仔馆内等待出售,售价一般约90—100元,要在契约期内,由华工微薄的工资项下加上利息(月利4%)扣还。成交以后,由猪仔头以暴力胁迫华工到华民政务司问话,当场同买主订立契约,期限从半年到一至三年不等。契约期内,华工无人身自由,一切任凭雇主摆布,忍受雇主或工头的鞭打,并可能被转卖。契约期满,如债务尚未偿清,契约即无限期延长。据不完全统计,从1881—1930年间,到达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共约830万人,[26](P180, 205—206)其中70%是猪仔。换句话说,这50年里共运去了近600万名华工,平均每年达10多万名。这当中,亦有许多是来自海南的。“据估计,至二十世纪初,出口的海南华工约30万人,其中大部分属被掠之华工,而这些华工中出自文昌、琼山、琼海、万宁居多”。[25]

当时的东南亚,大致可以分为缅甸、海峡殖

① 一种说法是,“猪仔”一词,顾名思义,把人比作畜类,象征着华工的奴隶地位。另一种说法认为,人口贩子把大群华工塞进拥挤不堪的底层统舱,同运猪一样,所以形象地把他们称为“猪仔”。

② 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之外务部档。内容为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三日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致外务部电呈。

③ 又据《美国外交文件和公档汇编》(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第17卷第6号文件记载,1855年时,澳门有猪仔馆5所。而直到1906年,香港还有23家囚禁苦力的猪仔馆。

民地、马来亚(以上为英国殖民地)、暹罗(泰国)、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先由西班牙占据,1898年美西战争后由美国占领)七个地区。这里本是传统上中国民众向海外移民的主要地点,鸦片战争以后,移民

人数更是急剧增长,与以前相比表现出质的不同。根据较确切的统计,仅从1869到1939年的70年间,就至少有1470多万华侨移民流入。下表反映了这一时期逐年到达东南亚和从东南亚归国的华侨人数:

中国人向东南亚的移民(1869—1939年)<sup>①</sup>

年代	到达人数	归国人数	年代	到达人数	归国人数	年代	到达人数	归国人数
1869	20824		1893	186269	150513	1917	218612	142809
1870	22282		1894	178601	134396	1918	137342	118271
1871	21132		1895	224315	125036	1919	169357	190648
1872	27013		1896	196942	143758	1920	248866	189396
1873	15082	1528	1897	156273	143680	1921	334388	240987
1874	36516	17186	1898	176963	141566	1922	261454	254688
1875	42564	22389	1899	196585	149815	1923	302541	218989
1876	80272	65756	1900	245653	157252	1924	326074	257943
1877	63013	47655	1901	219998	175452	1925	329731	244437
1878	63745	47682	1902	245437	170306	1926	516793	291551
1879	68730	65095	1903	276207	192215	1927	567663	404989
1880	86405	59966	1904	241890	194033	1928	523422	357983
1881	130496	72212	1905	204954	148034	1929	352845	275267
1882	170672	83383	1906	248984	183260	1930	303192	313977
1883	150388	109841	1907	314435	210276	1931	227398	466229
1884	148315	106883	1908	222616	212369	1932	127417	390453
1885	139225	116254	1909	221846	211488	1933	118229	224725
1886	170081	119242	1910	304431	210612	1934	221249	188591
1887	172400	146006	1911	332985	211149	1935	251453	199144
1888	206788	142342	1912	344900	219706	1936	268219	210065
1889	161812	132661	1913	332108	249275	1937	387634	182279
1890	148136	137535	1914	219766	264632	1938	203911	120568
1891	155735	138767	1915	188617	180425	1939	110276	88679
1892	158087	134820	1916	272896	134712	合计	14721450	1165383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也列入同样是移民大国的印度这一时期向东南亚移民的数据,

以资比较。参见下表:

中国人、印度人移民东南亚情况(1891—1938年)<sup>②</sup>

年代	中国人		印度人	
	到达人数	归国人数	到达人数	归国人数
1891—1900	1,875,423	1,419,603	1,423,756	1,064,070
1901—1910	2,500,798	1,908,045	2,836,691	2,434,993
1911—1920	2,465,449	1,901,023	3,795,985	3,145,913
1921—1930	3,818,103	2,860,811	4,851,130	4,093,655
1931—1938	1,805,510	1,982,054	2,651,139	2,524,491
合计	12,465,283	10,071,536	15,558,701	13,263,122

由以上两表可见:无论是中国人移民还是印度人移民,大部分均为一季或二、三年的短期

① 本表资料来源: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Blue Books(Hong Kong),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s. 可児弘明「香港移民统计资料(アジア・インド洋方面关系)」,『CAS(庆应义塾大学地域研究センター)ニューズレター』55号,1993年4月。杉原薫「华侨の移民ネットワークと東南アジア经济——十九世纪末——一九三〇年代を中心に」,『アジアから考える』(5),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印行。

② 本表资料,中国的数字据上表计算,印度的数字据Cheng, S. H., The Rice Industry of Burma, 1852—1940, Kuala Lumpur, 1968, pp. 262—263. Sandhu, K. S.,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Cambridge, 1969, pp. 312—313, 316—317.

居留,其后则返回中国或印度。印度侨民的归国率为85%,中国侨民的归国率亦高达81%。但是,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华侨和印侨在东南亚国家定居下来。据说,与印侨相比,定居华侨的规模和经济影响力要大得多。[27]这样,到1930年代中期,已经有大约620万华侨在东南亚各国定居,这一数字,占到全世界华侨总数的近80%。如下表所示:

定居东南亚华侨人数(1934年)<sup>①</sup>

国别	人数
暹罗	2,500,000
马来半岛	1,709,392
荷属东印度	1,232,650
法属印度支那	381,417
缅甸	193,598
菲律宾	110,500
英属文莱	75,000
合计	6,202,557 (79%)
世界共计	7,838,895 (100%)

不难看出,自1870年代以降,中国向东南亚移民的人数呈迅速上升趋势,到20世纪初年迎来了第一次移民高峰。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所下降,但很快到20年代又出现了第二次移民浪潮。1929年到1930年代前半期,受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向海外移民的人数急剧减少,从1934年起开始缓慢回升,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又恢复到相当的水准,其后再次下跌。进入40年代后,由于战争的影响,从统计数字上把握移民人数的动态变得十分困难。移民人数的减少虽然是事实,但是并不能说移民的流动就此已经处于停顿的状态。[28](P110)

如图所示,华侨出国者人数与归国者人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上是相一致的。30年代前期,归国者人数一度高于出国者人数,1931—1933年间,华侨归国者多达108万人,比出国人数高出61万多人,其直接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造成了对劳动力需求的一时减少,此外,也有英属马来亚殖民政府于1928年颁布《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nts Restriction Ordinance)的影响。[29](P123—131)法令的变更,说到底仍然不过是反映社会经济

状态的特别措施而已。随着世界经济景气的回升,1934—1937年间,华侨出国人数再次迅猛增长,而且,即使在1938年后由于战争的原因造成移民流动益形困难,但移民网络仍然能够继续维持着相当活跃的机能。

在东南亚方面,接受华侨的主要国家为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其次为印度支那、海峡殖民地、英属布里南、菲律宾,等等。但是在实际上,海峡殖民地、特别是新加坡,担负着向三大主要移民区域调整移民流动的重要职能,换言之,可以说海峡殖民地、尤其新加坡是华侨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中转站和枢纽。华侨向东南亚移民的最初到达地点,主要集中于海峡殖民地。从1880年代开始,通往泰国的直接航线的重要性逐渐增加,1907年时首次超过到达海峡殖民地的华侨移民人数,但到1934年后,再次回到以海峡殖民地占主导地位。另有一条直接航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航线,在1910年代末期也曾一度凌驾于到达海峡殖民地的航线之上,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仍然是海峡殖民地在接受刚刚到达东南亚的中国移民方面的地位最为重要。可以说,向东南亚移民的华侨,三分之二以上是以海峡殖民地为其最初到达地点的。<sup>②</sup>

这样一来,在不断到达的新移民之外,在东南亚地区内部还存在着一种所谓的“环流移民”(circulatory migration),即除了不断由中国移居东南亚的“新客”(sinkhehs)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已有一定移民经验的“旧客”(或称“老客”laukhehs),不断根据东南亚各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流动着。这些“环流移民”的确切数字虽然很难统计,但是他们作为国际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竞争性力量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知,华侨移民并不是单纯地在出生地与移居地之间往返运动,而是敏感地反映着华南与东南亚地区劳动力的总体需求,形成一种颇具特色的移民网络。

#### 四

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海南已有帆船陆续从文昌的清澜港或海口港起航,运载商品到新加坡、槟榔屿等地。有些人为了经商需要,就此留居彼处,是极有可能之事。新加坡学者韩山

<sup>①</sup>资料来源:企画院『华侨の研究』,松山房1939年版,页4。按,数字原据1934年的中国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海外各地的领事汇报推算。

<sup>②</sup>根据海峡殖民地政府蓝皮书(Blue Books)的统计,1881—1939年来自中国的入国人数占同期华人向东南亚移民总数的68%。参见前列诸表的数字。

元在《琼州人南来沧桑史》的演讲<sup>①</sup>中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海禁逐步解除。在此之前，已有海南人来马六甲、檳城定居，但来新加坡的不多，虽有海南商人经常乘帆船南来进行贸易，但他们只在新加坡作短暂逗留就回国。”[30] (P263-264) 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渐开，海南籍人移居东南亚一带的日渐增多。这一点，从新加坡的户口记录中也可看出。新加坡第一次有户口统计记录是1824年，是年全星人口10,638名，其中华人3,317名，未列省籍，估计闽、粤籍人士为多。1881年新加坡的户口统计，正式列出各籍华人数，海南籍人为8,319名。1911年为10,504人，1931年时增长为19,896人，到1947年增加到52,000多人。[2] (P265-270)

大致说来，从鸦片战争后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百多年间，海南人向南洋的迁徙经历过4次高潮：

第一波，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时海禁解除，为了谋生的需要，海南人大批移居东南亚各国。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sup>②</sup>，就是在1873年（一说1874年）13岁时和他的哥哥韩政准一起，来到东印度群岛，在一个亲戚家中当学徒。[3] 随着移民人数日渐增加，为了互通声息，互相照顾，遂有组织同乡会的打算。约在1854年，韩旺彝（又名韩亚二）和王志德等琼籍人士在新加坡召集同乡开会，议决组建琼州会馆。“他们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下马拉峇街6号三间相连的屋子，作为同乡联络的中心”。这就是现今新加坡琼州会馆的前身。[30] (P263-264)

第二波，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新加坡、马来亚橡胶种植业兴起，马来半岛上锡矿业亦有大的发展，对劳工的需求甚殷，加上中国国内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遂使海南人大量前往南洋谋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三十日至次年二月三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从海南岛海口港向新加坡等处移民者，“男子3101名，妇女33名，幼童306名”。[32]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十日、十二日、十四日三天之内，从海口港乘船前往新加坡等地的移民为“男子5617名，妇女45名，幼童604名”。[32] 仅从以上两

例，即可看到这一时期海南民众向东南亚移民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又据资料，清末1902—1911年间，从海南迁往新加坡和泰国的人口，平均每年达2.7万人。[33] (P85)<sup>③</sup>

第三波，民国成立以后，战乱兵燹，动荡不安，20年代后，内战愈演愈烈，民不聊生；适逢英国在新加坡三巴旺拓展军港，兴建远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迫切需要大批劳工和家庭帮佣，两方面的因素凑合，导致了琼州人的又一次出国潮。民国十二年（1923年），琼侨迁居海外1.8万人；1927年更高达4.8万人之多。[33] (P85)

在这一时期，有一个新情况值得注意，就是自1921年起，“琼州妇女南来渐多，在此之前，海南岛绝少有妇女南来。许多妇女南来与丈夫团聚，或嫁到南洋来（‘过番新娘’），使琼州人在新、马人数大增”。[30] (P263-264) 这里所说的情况与当时在海南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的记述是一致的。传教士的所见所闻中述及：“那些想去南洋的男人，不被允许带着他们的妻子同去，因此许多海南岛上年轻的妻子们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寡妇，可是她们又没有一个寡妇所享有的自由”。[34] (P52) 确实，在整个19世纪，没有过海南女性出洋的事例。虽然当时地方政府并没有禁止或限制妇女出洋的明文规定，可是各种经济的、社会的、习俗的原因，却让海南的妇女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人曾经分析过“当时琼籍男性出洋到新加坡来，不携带妻子同行的原因”：“第一，琼籍人士严守孔孟礼教的传统哲学，所以丈夫出洋谋生，妻子则在家中孝敬父老以尽妇德。第二，当时来番的新客都不想在外长久居留，所以不想携带家眷。第三，当时的新客大都是劳动工人，所赚的收入有限，既要按月付款返家，又从何能在异乡供养妻子。第四，当地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是移居新加坡的妇女都是不良的女性”。“基于上述原因，所以在1904年以前，没有琼籍女性到新加坡来。”[2] (P265-270)

进入20世纪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据说1904年时，第一位琼籍女性“偷渡”到了新加坡。“这位琼籍女性的胆量过人，她首先到香港，学

<sup>①</sup> 韩山元为新加坡琼州会馆文教部副主任，该演讲是他在1988年2月27日举办的“琼州人南来新加坡历史”讲座上的发言。

<sup>②</sup> 原名韩教准，祖籍海南文昌县。韩教准后来过继给婶母的弟弟，改姓宋。其兄韩政准，终身未婚，以84岁高龄在马来半岛逝世。

<sup>③</sup> 另有一说，1902—1911年间，“海南每年向海外移居的人口大约有四万。他们多到东南亚的泰国、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以及新加坡等地。”据符永良的《海南人·海南话》，《新加坡琼州会馆会讯》第16期，第28页。



会了广府话,而打扮为广东妇女,由香港转渡到新加坡。这位勇敢的琼籍女性抵星时,住在一家客栈里,曾引起了一场‘震动’。但由于她的‘偷渡’成功,后来大批的琼籍女性也就纷纷南来。”[21](P265-270)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海南女性出洋的并不很多。前引1907年和1908年的历史资料表明,在两次有确切数字的移民人群中,比例为男子占89.8%,儿童占9.4%,妇女只占0.8%。[32]可见在海南的移民人群中,绝大多数都是成年男子,儿童也占将近一成,妇女人数则微乎其微。

20年代后,各种限制女子出洋的习俗日渐淡薄。女子在马来亚成年华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1921年为23%,1931年上升为29%,到1937年又进一步上升为36%。“来到橡胶种植园和锡矿山的成年女性,半数以上为已婚者,夫妻组成家庭在种植园和矿山附近居住。”[35](P18)在这一时期,海南女性出洋的人数逐渐增多,但即便如此,据1931年海峡殖民地的户口调查,新加坡琼籍人口男女两性的比例仍然为1000:151,远远低于上述华侨人口中女子所占比重。可见直到此时,“(在新加坡的)琼籍男性大都是返回家乡成婚,然后留妻子在乡里,自己

再出洋”。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侨民比较,琼籍侨民的观念和行为都显得更为保守,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在于琼籍侨民在海外的较低的经济地位。到1947年时,新加坡男女两性的比例改变为1000:554。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环境的变迁,观念的改变和经济地位的改善,在海外的琼籍男性大都在本地成家立室,并且也已经打破以往的惯例,而与其他籍贯人士通婚了。[36](P85)

第四波,1937年日本侵华,华南各省相继沦陷。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海南,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由海南岛去海外做工的华侨人数,可以说非常之多,仅在南洋方面,至今已经达到39万人,其中泰国为25万人,马来亚为10.2万人,印度支那为3.8万人。这一数字约占海南岛全部人口的18%,可见海南岛向海外移民的数量非常之大。由这一数字,可以想见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移民从海南岛移居国外。”[37](P35)当时的南洋琼侨已经达到近40万人,而据1930年海南区善后公署专员黄强的调查统计,海南岛各市县的人口总数为2 195 645人,移民人数已经占到人口总数的将近五分之一。见下列海南人口统计表 37)(P24):

海南人口统计(1930年)

市县别	户数	男数	女数	总数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海口市	4502	26000	19454	45454	5269
琼山县	58328	182529	158340	340879	104
文昌县	67302	234470	205719	440189	194
定安县	33034	110970	81698	192668	59
琼东县	12678	50054	47360	97414	127
乐会县	18603	62113	57163	119276	71
万宁县	22471	91950	73560	165510	86
陵水县	7072	34463	29584	64047	24
崖县	15266	50511	46906	97417	23
感恩县	7321	18328	16803	35131	12
昌江县	9826	24092	21797	45924	21
儋县	38224	108122	99563	207685	70
临高县	41164	92612	73276	165888	78
澄迈县	35009	106881	71282	178163	89
合计	370800	1193106	1002529	2195645	平均 68

抗日战争结束后,接着又是连年内战,社会扰攘不已,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有亲戚在南洋者大多南来谋生。所以这几年来,在东南亚的海南侨民人口增长很快,1947年的统计,仅新加坡就达52,000多人,比1931年时统计的19,896人增加了32,000多人,远远超过鸦片战争后一

百年里海南人向新加坡移民人数的总和。

早期,海南人下南洋乘坐帆船,载重量大约在2 000吨到2 500吨之间,多是客、货同载。下南洋乘坐的帆船或从海口港,或从文昌县的清澜港启程,横渡东京湾,再沿着印度支那海岸航行,到达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约需12天左右。

“这类帆船横过七洲洋,若不幸遇到狂风巨浪,整只船便沉没海中”,[30](P263-264)所以人们都把这条航路看作是凶险莫测的。以往多认为,清澜港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一直是海南人出洋的主要口岸,20年代以后,海口港才取代了清澜港,成为海南移民的主要口岸。[38](P10)然而,据美国传教士的观察记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运载苦力的大型轮船已在海口停靠,把那些想去南洋的人们送往他们的目的地”。[34](P55)可见海南岛向外移民的主要口岸的变动,时间恐怕要比以往认为的要早,而且很可能已经由轮船取代早期的帆船了。在华工出洋人数最多的厦门、汕头两地,1870年代前,华工出洋主要是乘坐帆船,1870年代后,“以低廉的运费、较快的速度和定期的航班作为竞争的手段,轮船迅速地取代了帆船的地位”。[38](P45)在海南,轮船取代帆船的过程可能不如厦门、汕头等地那么迅速,但是也不会晚得太久。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崛起,为了准备向东南亚扩张势力,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专门对中国在东南亚的移民情况作过调查,在该调查报告的《中国海外移民之原因及其前往海外状况》一节里,列举了4项华人选择移居海外的原因:1)生计困难;2)移民出发地具有敢于冒险的民风;3)率先移民者取得成功事例的激励;4)劝诱移民在当地盛行。[39](P386-387)

显然,占第一位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生活贫困,无法为生,迫于生计不得不远赴海外,这肯定是包括海南人在内的绝大多数华侨向海外移民的最主要的原因。不过,迫于生计尽管是主要原因,却未必是唯一原因。日本人的调查报告提到:“移民者的生活困难,并非使其移民海外的唯一原因。他们的生产收入虽然甚少,但是因其生活水准甚低,又甘于困穷,所以尚不难勉强保持衣食供应之现状。”试以当时一般农民的生活状况为例,稍有一技之长者如木匠、石匠及其他劳动者,“彼等一日之收入至少二十四、五钱,多者为四十钱以上,而每日实际生活费用为十钱上下足矣。对于彼等来说,若思单纯免除饥渴寒暑,可谓并未陷于穷迫之绝境。”[39](P387)

对于这些能够聊以勉强维持温饱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之所以走上充满风险、前途未卜的海外移民之路,乃是由于“受到率先移民者取得

成功事例的激励”。“既往之移民海外者,数年后或有携回巨额财产,夸示于乡党者;或有在海外拥资巨万,跻身豪商行列者。如此之所见所闻,刺激助长了乡间民众的功名逐利之心。”[39](P387-388)情况确实如此,移民海外可能的确要比株守故乡较易发财致富。据日本人对南洋华侨的调查,“该等移民多数均为下层劳动者,但是经年力作勤俭,结果积蓄相当财产,成为殷商者亦有不少。即便不能获得意外之成功,他们在海外劳作若干年后回国,亦易于依靠劳动以外之生业,积存安度余生之资财。于是,既往之成功者诱招家乡之亲戚故旧,乡里无业者亦藉熟悉在外移民者之便而思移民海外,故海外移民人数遂呈连年增加之势。”[39](P385-386)可见海外移民多为下层劳动群众,经过长期努力而发家致富者大有人在,即使未能成为豪商巨富,一般也都小有积蓄,足以安度余生或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这样的‘田舍翁一朝成巨富’的事迹流传乡里,家喻户晓,成为每年成千上万同胞远赴万里海外的原因之一。”[40](P235)

无论作为个体来说,海南人下南洋的具体原因和背景是如何不同,但“一般地说,琼州人南来的主要原因是在家乡生活太贫困,被天灾人祸(特别是战祸)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离乡背井。”[30](P263-264)经济上的原因总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从上文所列举的史料和分析的原因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下面,为了增加一点感性认识,再考察两个具体的个案。

一个是移民马来亚的海南华侨龙鹏植。龙鹏植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祖籍文昌县会文镇龙家村,幼时仅读过4年私塾便因家贫辍学。17岁时仍留着长辫,从未涉足过距村8里的会文市以外的地方。“龙家村靠近南海,遍地红粉沙土,难长庄稼,‘三月东风(带有盐分的海风)晒死草’,连椰子叶都被吹黄了。家乡一带地瘠民穷,杂食代粮,几乎家家都有人去南洋,家家都有‘番客’。”民国三年(1914年),龙鹏植的祖父去世,家道日下,尚未成年的龙鹏植“被祖母领到粉土(现冠南墟)海圯,登上了去南洋的大木船,从此开始了近80年的‘番客’生涯。”[41](P201)

另一个是名列新加坡琼籍殷商之首,历任多届新加坡琼州会馆主席和中华总商会董事的王绍经。王绍经原籍海南乐会县(今琼海县)温泉区温泉乡石角边沟村,生于清咸丰十年(1860

年)。“幼年家景贫寒,其祖屋低矮窄小,父母靠耕田过活,养育绍经三兄弟非常艰苦”。18岁那年,他与同县林氏结婚成家,不久长子出生,“家里添了孩子,生活就更困难了。眼看着家里日子难挨,当时故乡有不少人被迫出洋谋生,他便萌生了出洋闯生活出路的念头。一八八四年初夏,二十四岁的王绍经辞别了妻儿老小,抱着到异乡闯一番事业的决心,踏上了南行的征途。他行装简单,身上仅带四块光洋,还特别带上一瓶用金桔和辣椒腌制的辣椒酱。背上简单的行装,他从家乡步行,沿途买稀饭粗菜配辣椒酱吃,吃半肚饿半肚的上路,连晚上寄宿的也是便

宜客栈。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来到琼山县的潭口,然后过南渡江从海口港坐小帆船渡洋……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天,历尽了多少艰难险阻,终于抵达了新加坡港口,步入了人生征途中的另一番天地”。[42](P152)

到达东南亚国家的海南侨民面临着何种境遇?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对当地的开发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又与自己的祖国保持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凡此种种,限于篇幅,显然不可能在这一篇小文里述及,我们将另文详述。

####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华侨与辛亥革命[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2] [日]松浦章. 清代的海外贸易について[A]. 关西大学文学论集创立百周年纪念号(上卷)[C]. 大阪: 关西大学, 1986.
- [3] 福建按察使王丕烈奏折(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七日)[Z]. 明清史料(庚编第八本)[C]. 台北: 故宫博物院, 1975.
- [4] 任光印, 张汝霖. 澳门纪略(上卷)[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52.
- [5] 硃批谕旨(第四十六册)[Z]. 台北: 台湾国史馆, 1986.
- [6] 郝玉麟奏折[A].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一辑)[Z]. 台北: 故宫博物院, 1979.
- [7] [日]华夷变态(上册). 东京: 东洋文库, 1958.
- [8] [日]华夷变态(中册). 东京: 东洋文库, 1958.
- [9] [日]华夷变态(下册). 东京: 东洋文库, 1959.
- [10] Minutes of Evidence befor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830.
- [11]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八辑)[Z]. 台北: 故宫博物院, 1978.
- [12]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二辑)[Z]. 台北: 故宫博物院, 1979.
- [13] 朱杰勤. 1740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红溪事件[J]. 历史教学, 1962, (11): 5.
- [14]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一辑)[Z]. 台北: 故宫博物院, 1979.
- [15] 庄国士. 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 [16] [日]大庭秀昭. 江戸時代の日中秘通[M]. 东京: 东方选书, 1990.
- [17] John Crawfo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1828 first ed., reprinted 1987.
- [18]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Reports, 1876, Swatow.
- [19] [日]刘序枫. 十七、八世紀の中国と东アジア——清朝の海外貿易政策を中心に[A]. 沟口雄三, 滨下武志, 等. アジアから考える(2)[C].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
- [20] Da Chen, Chinese Migration, New York, 1923.
- [21] 吴华. 星洲琼籍人士之今与昔[A]. 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刊[Z]. 新加坡: 琼州会馆, 1989.
- [22] [日]滨下武志. 华侨史に見る社会伦理——华侨—華人—華裔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J]. 思想, 1991, (801): 25.
- [23] [新加坡]南洋年鉴(第一回)[Z]. 新加坡: 南洋商报, 1939.
- [24] 李长傅. 南洋华侨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 [25] 林日举, 李琼兴.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及岛内人民的抗争[J]. 琼州大学学报, 1998, (4): 95—99.
- [26] Mencarini, The Chinese Labor Questions in Philippine, Journal of British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 1900—1901.
- [27] [日]杉原薰. インド人移民とプランテーション经济——十九世紀末——第一次大戦期を中心に[J]. 社会经济史学, 1981, 47(4): 29.
- [28] China, Maritime Customs, The Trade of China, Annual Report, 1940.
- [29] [日]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 英領马来・緬甸及濠洲に於ける华侨[M]. 东京: 南洋华侨丛书(5), 1941.

- [ 30] 韩山元. 琼州人南来沧桑史[ A]. 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刊[ Z]. 新加坡: 琼州会馆, 1989.
- [ 31] 韩山元. 宋氏家族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访宋庆龄堂弟谈宋氏家族[ N]. 联合晚报, 1988-01-03, 4(3).
- [ 32] 朱荣基. 光绪末期海口贩运华工出洋若干史实[ J]. 历史档案. 1984, (4): 24-29.
- [ 33] 詹长智. 中国人口(海南分册)[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3.
- [ 34]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Island of Hainan, South China, The Isle of Palms, Sketches of Haina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ed, 1919.
- [ 35] Federated Malay States, Methods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of Chinese Labour 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40.
- [ 36] 陈序传. 星加坡琼州人[ A]. 新加坡琼州会馆琼州天后宫大厦落成纪念特刊[ Z]. 新加坡: 琼州会馆, 1963.
- [ 37] 海南島の民族と卫生の概況[ M]. 东京: 东亚研究所, 1939.
- [ 38] [日]可儿弘明. 近代中国の苦力と“猪花”[ M]. 东京: 岩波书店, 1979.
- [ 39] [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福建事情调查报告[ M]. 东京: 三五公司, 明治四十年.
- [ 40] 郑林宽. 福建华侨の送金[ M]. 池田孝道译. 东京: 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 1943.
- [ 41] 龙建武. 一个普通华侨的恋乡情怀——忆我的伯父龙鹏植[ A]. 海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海南文史资料(第十辑)[ C].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1994.
- [ 42] 前任会馆总理王绍经公传略[ A]. 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刊[ Z]. 新加坡: 琼州会馆, 1989.

(责任编辑 郭志东)

##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Hainan Natives' Immigration to Southeast Asia

WANG Xiang

(Research Center of Social Science,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d-part of the Ming Dynasty, Hainan ha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wave of Chinese immigration abroad, but this issue has not yet been adequately probed into. By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Hainan natives' immigration to the Southeast Asia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immigration abroad and consulting documents written in Chinese, English and Japanese languages, one can sketch the general historical process of Hainan natives' immigration.

**Key words:** Hainan natives; immigration; Southeast Asia

## 征 稿 启 事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在国内外发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双月刊,曾三次荣获海南省优秀社科期刊称号,2001年9月加入“中国期刊方阵”,并在北京展出。所刊发文章转载率高达40%以上,在高校及学术界有较好的影响。本刊实行双向不记名审稿制度,现特向海内外征集优秀学术论文。

1. 来稿一般在10,000字内,好稿则不限。
2. 来稿必须提供打印件并附光盘,也可通过电子信箱(xbwk@hainnu.edu.cn)方式传送。
3. 来稿必须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有关规定为标准,每稿有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作者简介,参考文献要具体到页码或报纸版别,详细格式可参照本刊发表的同类文章。
4. 来稿恕不退还,作者在2个月内未接到录用通知可自行处理。
5. 来稿请注明联系方式,包括通信地址、电话及电子信箱等。

海南师范学院学术期刊社